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译释学概观^{*}

牛云平 杨秀敏

【提要】口头和笔头翻译、释解中外典籍是我国学术传统的主要表现形态,本文称之为“中国译释学”。魏晋南北朝时,经学转衰、增容,佛学东流,中国经学译释(经)和佛典译释(纬)纵横交织,在译释技术、译释主体和译释效果各层面都踊跃互动,促成了我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放异彩的高峰期。译释学由魏吴时的调经制纬,历西晋时经纬初交,东晋十六国时飞梭走线,至南朝臻于锦绣斑斓之象,而在北朝特殊时局下再次归于平行发展。

【关键词】佛经 经学 译释者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2-0101-06

一、中国译释学的概念、缘起及其研究对象

(一) 概念描述

中国译释学指研究、描述和解释我国境内中外语文之间、中国方言与民族共同语之间、中国方言与方言之间、中国古代语文与现代语文之间语义字义的口头或笔头解释和阐发现象的学问。其英文名为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它是我们根据“翻译”一词的语义规范提出的新术语。

中国译释学是一个包含译释实践和译释理论的连续体。在实践层面上,它是描述性、自指性的;在理论层面上,它是分析性、思辨性的。本文所言中国译释学侧重其实践层面,主要指以孔子“述而不作”论为代表的、对中外文化典籍进行口头或书面翻译、释解的学问。这是一条用既有形式进行思想创新的独特技术路线,是我国学术传统的主干。

(二) 命名缘起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揭示,语言与思维具有同构性,语言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制约着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表现,导致程度不一的认知差异。辜正坤先生的互构语言学原理进一步指出,“语言不仅模拟存在,它也反作用于存在,重新拟构存在。”^①“translate”一词在翻译学界产生的认知与理解结果即是一个适例。

1959年,雅可布逊在《论翻译的语言学方面》一文中提出,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种,其中语内翻译不过是更换

^{*} 本文为2015年度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研究项目(项目编号:MTIJZW201508)、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5020501)、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15YY048;HB15WX026)和2015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GH151110)阶段性成果。

^① 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说法罢了,符际翻译则是变形,唯有语际翻译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①此语频见征引,已成学界经典断语。在以“Translation Studies”命名的西方翻译研究界,论及翻译,所谈者莫不是雅可布逊所言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现象。在我国,翻译学科姓“外”——翻译学归属于以英语语种教研为主业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其研究队伍绝大多数都分布在以英语语种教研为主业的外语类院校或非外语类大学的外语院系。此种现象的成因,主要在于“translate”之构成及其语义的诱导暗示力量。

我们曾专文指出,“translate”一词的生成和语义在源流上与“翻译”一词殊途异归。在“translate”本义“(将人、物等)从一地运送/带到另一地,移换位置/场所/地位”的规约下,“translate”意味着语言文字在发生形式变换的同时,还必须要经历物理空间和场所的彻底更换。它要落实在纸面上,是物本主义的。而“译”不同,它本指“语官进行口头解释、说明”,到佛经汉译事业勃兴之后才逐渐衍生了“誊写”之意。因此“翻译”是人本主义的。^②二者语义在“换用语言文字形式来表达意义”一点上有所交叠。可国内外翻译学界视为本学科立足之基的正是这有限的交叠部分,且视之为唯一的合法基础,而将二词的其他内涵弃之不顾。以雅可布逊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受“translate”语义规则约束,而将英、法、德、西、葡等语言之间的换形表义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尚情有可原。以汉语为母语、可同时使用汉英双语(甚至更多语文)从事学术研究的我国翻译学界若也踵武其后,不事分辨,则无疑是自动放弃了大片疆域,专挑那西式曲径去走了。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全民通用的工具书。它如此解释作为动词的“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③这就是说,“翻译”不仅与“translate”有着概

念内涵上的差异,更有着外延上的显著区别。译学界公认为翻译故事的《越人歌》之越楚方言翻译^④和支谦等佛经翻译家的译释实际^⑤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翻译”与“translate”作为我国翻译学和西方 Translation Studies 学科术语系统的内核,实际上规划出的是非常不同的研究版图。翻译学的疆界包括并远远超出 Translation Studies 的领域。

鉴于此,我们主张,在汉语文语境内,“翻译学”的理解和使用应符合其自身的语义规范。同时,为避免我国的翻译学科被继续混同于西方的“Translation Studies”,采用中国译释学这一概念。不称之为诠释学或解经学,也因二者有着太强的西学意味。

(三) 研究对象

中国译释学的研究重心,首先在译释技术上,涵盖现有翻译学和训诂学的全部术语系统。其构架有纵横两大动脉:(1)纵向为经,以我国丰富文化典籍的历代译释为主,如古今典籍的传、章句、训诂、笺、注、疏等,儒经注疏为其典型;(2)横向为纬,以外国文化典籍向我国传入的跨越性口头或笔头译释为主,持续上千年的佛典汉译和四百多年来的西学汉译即其典型。它与我国整部学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相伴生。

其次,译释技术不是在空中发生的,译释学研究必然涉及到译释现象中的诸多主体因素,如作者、译释者、读者、听众等;也必然涉及到诸多客体因素,如以文本或语篇形式留存下来的译释成品。

这就是说,开展中国译释学研究可从三大要

① Jakobson, R. On the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Third Edition).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2, p. 127.

② 牛云平、杨秀敏:《人本与物本——“翻译”与“translate”语义谱系分析比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③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74页。

④ 事见刘向:《说苑·善说》。

⑤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素入手：人（译释主体）、物（作为译释成品的语言或文本）、事（译释形态、技艺及其效果史）。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译释学的研究目的

我国古代学术的主流形态就是对经、史、子、集原典进行持续译释，我国文化五千多年来绵延不坠，要诀之一正在于中国译释学学术形态的存在。先秦时期，我国基本文化典籍形成，孔子述而不作，开启中国译释学的奠基期。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学复兴，译释学获得皇权认可，取得官学地位，至郑玄遍注群经臻于极盛，为中国译释学的纵脉兴盛期。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飘摇，但译释主体空前多样，译释学经纬交织尤为绵密，创造了思想文化新局面，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一大高峰，也即中国译释学第一大高峰期。世传十三经注疏中，除《孝经》为唐明皇亲注外，其余十二经至此皆已完成。其中，有六种是汉代学者所注，六种是魏晋学者所注。同时，佛典译释渐次由民间自发变为取得官方乃至皇家的支持，最终登堂入室，融入学术主流。

在此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近四百年中，中国境域内的译释群体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件？其译释技术出现了哪些变化？产生了哪些译释成品？使儒、佛二学到唐代终成分庭抗礼之势？下文从历史比较的视野，用共时比较的方法，探赜索隐，按照时间顺序就这几大问题展开探索，勾勒出我国学术界在第一次西学输入大潮中的生态和应对姿态，展现我国文化的第一次扩容历程。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译释学的五幅图景

（一）魏、吴（公元220～280年）译释学：调经制纬

此时期学术大象：三国承汉末乱局，儒风变通，儒家已习惯像郑玄那样破除师法家法的门户而遍注群经，产生了王朗王肃父子、虞翻、董遇、谯周等一批通儒。在新的政局和学风下，译释之学开始大幅扩展，《易》、《老》、《庄》的

玄理研讨与创制，为儒佛交通架起了桥梁。

魏国承袭前朝政治中心洛阳，该城亦为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魏皇室继续奖掖儒学，立于学官的有《易》、《书》、《毛诗》、《周官》、《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凡十一经；其经学十九博士中，郑学有七，王学有八，服虔、颜氏、何休、尹更始之学各一。^① 旧儒学因积弊而下滑。与此同时，出现两股新潮流。其一：在魏国社会上层的知识界，译释之学由儒经《易》及于《老》、《庄》等道学典籍，出现了何晏、荀粲、王弼、阮籍、嵇康等玄儒。玄儒借译释三玄思想而从旧典创制新意，故本文认为，玄学实为经学增容与蜕变之特殊形态。东汉应劭（约153～196年）曾著《汉书集解》，^② 惜不传。至魏代何晏等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诸家《论语》说，并下己意，为《论语集解》，重开集解之风。其二：在魏国的社会下层和在处于地域边境及文化边缘的吴国，佛典译释渐趋活跃。魏国政局飘摇，士林仍视梵客胡僧为方士，佛典译释与经学译释各行其是。而吴主孙权继承后汉黄老迷信，也将外来沙门视为身怀异术的方士。汉末避居吴地的优婆塞支谦博览经籍、综习世间技艺、通晓六国语言，因才慧受到孙权礼遇，拜为博士，辅导东宫。支谦于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开始译经，至建业中（公元253年），共译释佛经五十多部。^③ 且辅助后来的天竺沙门维祇难、竺律炎等译经。支谦所创之会译法^④或受经学译释启发而成。其《瑞应本起经》中称释迦牟尼之变化“随时而现，或为圣帝，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已见援儒入佛之法，附益儒学之意。吴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设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⑤ 期间，康僧会至吴，

① 参见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482页。

② 事见《后汉书·应劭传》。

③ 事见《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⑤ 参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因神异求得舍利而令孙权叹服，并为康僧会建了江左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佛法遂兴。^①

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昙柯迦罗至洛阳，在白马寺出《僧祇戒心》，始创中夏戒法，大兴佛法。随后，康僧铠、昙柯迦罗、昙谛、白延、无罗叉、竺叔兰等外国沙门在洛阳从事佛经译释，出《四分律》、《无量清静平等觉》、《佛说须赖经》等多经。此期内，何晏、王弼等一代玄宗已经辞世；在司马氏高压威逼之下，阮籍、向秀、嵇康等玄儒的译释活动转入低潮，为晋代佛儒互动铺好了路径。

（二）西晋（公元265～316年）译释学：经纬初交

此时期学术大象：西晋代魏灭吴，用九品官人法等选官制度封堵了下层士人的上升机会，保障了士族对政治、经济、学术的垄断特权，导致官学沦丧，私学发达。经学成为高门士族的专利，民间智士流向佛门。以竺昙摩罗刹为代表的佛典译释学大昌。竺叔兰和帛法祖等般若学者通过与之旨趣相投的玄学桥梁，步入主流玄儒的眼帘，为东晋儒佛合流打下了桩基。

此时期内，佛经译释学十分活跃，译释群体增加、译释经籍数量和质量令人瞩目，影响深远。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竺昙摩罗刹（晋名竺法护）自西域还，在长安、洛阳等北方文化中心译经，开始了与西晋相始终的五十年佛学译释生涯。法护遍学西域三十六种语文，贯综诂训，备识音义字体，至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辞世，共译释《婆罗门经》、《无尽意经》、《须真天子经》、《小品经》、《大般泥洹经》、《宝藏经》、《超日明三昧经》、《新道行经》、《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法华经》等165部佛经，^②并教僧徒数千，使佛学广流中华。法护祖先为月氏人，世居敦煌郡，因获敦煌菩萨之誉。康僧会在吴地施行教化的同时，至280年吴灭国，译释《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小品》、《六度集》、《杂譬喻》、《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经，并仿照汉地经学做法，制有《安般守意序》、《法镜经序》。孙皓曾问僧会佛言善恶报应之事，他便引《易》、《诗》以论证。^③汤用彤先

生称僧会“文辞典雅，颇援引中国理论。而其诸波罗蜜前均有短引，审其内容，决为会所制，非译自胡本。……《安般守意经》，乃译文与注疏混合而成，其注疏部分疑即陈慧、康僧会所共作”，^④更证明康僧会受儒学译释影响之深。西竺沙门强梁蒯至来华，译有《十二游经》，竺叔兰、无罗叉在陈留译出朱士行所得梵本为《放光般若》，以及《首楞严经》、《异昆摩罗诘经》等经。与这些高僧共同从事译释活动的有安文惠、百元信、张玄伯、孙休达、聂承远、聂道真、张仕明、张仲正、法献、竺力、帛元信、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竺法友、赵文龙等大量中外信徒。此外，僧人帛法祖、法祚兄弟在长安讲习佛经，且译释有《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首楞严经注》、《放光般若经注》等佛学典籍。沙门释法立、法炬、安法钦等在洛阳译释《法句经》、《大阿育王经》、《道神足无极变化经》、《文殊师利现宝藏经》、《阿闍贯王经》、《阿难目佉经》。310年，西竺沙门佛图澄来至洛阳，通过与汉地诸学土的论辩疑滞，并以神通征服石勒等中州胡晋，传扬了佛学。

荀勖、袁准、陈寿、韦昭、皇甫谧、杜预、束皙、裴颀、徐苗、刘兆、司马彪等通儒继续精勤于经学译释，著作丰赡，门徒众多。其中，杜预及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可视为经学译释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荀勖、束皙才学通博，译释了汲冢魏襄王墓所出《汲冢竹书》科斗文古字，学术贡献颇大。王衍、郭象、乐广等玄儒名动当世。王衍手持玉柄尘尾竟日玄谈，成为风尚，后学纷纷仰慕仿效。郭象尤被誉为仅次于王弼的玄学家，王衍称道他“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⑤其《庄子注》被视为对庄学的标准译释，另有《论语体略》、《论语隐》、《庄子音》等译释作品。

据《佛祖统纪·法运通塞志卷第十七之

① 事见《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

② 据《高僧传》卷1《竺昙摩罗刹传》。

③ 事见《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⑤ 事见《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三》，晋泰始二年（公元 265 年），中书监、侍中荀勖于洛阳造金像佛菩萨十二身放大光明，都人竞集瞻礼。在晋朝，侍中乃是朝廷要职，实具宰相之权，影响力极大。位居显要的荀勖能够在国都造作佛像，充分说明，佛学译释之功效已经上达统治阶级高层了。

（三）东晋与五胡十六国（公元 317～420 年）译释学：飞梭走线

此时期学术大象：东晋局势相对太平，故南渡士族谈风鼎盛，儒佛译释繁荣，玉柄尘尾成为政治角力的武器和玄义胜理的标志。南方学界花团锦簇、交相映衬，既有干宝、郭璞、范宁、徐邈、徐广等通儒，又有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玄儒、僧儒，还有支遁、竺道潜、慧远等常为讲筵霸主的名僧。他们共同宰治着东晋的思想文化场域。北方局势混乱、民求福德，故佛门人才济济，佛图澄、道安、竺道生等高僧深受政权礼遇，佛典译释十分发达。他们思维活跃，不断探求佛学实相；在讲经传道的同时，大量采用经学手法，创制佛学研究专著，发展蔚然可观。佛学译释和传布最盛的三时段中，道安时代和罗什时代两者均在此期；佛法自此深入中华文化。^①

东晋统治集团、高门士族和知识阶层中的王导、王敦、王珣、晋成帝、晋哀帝、晋元帝、晋明帝、庾亮、谢混、王濛、殷融、谢安、何充、王洽、刘恢、许询、郗超、孙绰、袁宏、王羲之、孙盛、殷浩、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一代名流都是玄谈名理的高手。另一方面，无论是博综儒道而入佛门的支遁、竺道潜、竺僧敷、竺法友、竺法蕴、康法识、竺法济、昙壹、竺道壹、帛道猷、道宝、法显，还是到晋都来的外国沙门帛尸梨蜜多罗、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等人，也都是通理经籍、辩才敏捷、善释义理的高僧。北方战乱使僧众辗转流徙，慧远、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罗等人先后到达东晋。在晋朝王公与名士的敬慕与配合下，佛玄儒译释活动相互贯综，学风大畅。玄儒和高僧两相悦纳，使东晋的译释学经纬交织频密。

在北方，后赵石勒石虎兄弟在佛图澄的指引下崇信佛学、奖掖经学，前秦苻坚亦然。政

权的保障使邺、长安等政治、文化中心的译释学经纬顺畅交织。经过佛图澄的努力，北方佛学建设成就斐然，道安、竺法雅、康法朗、法汰、法和都曾从他受业。在道安、竺法雅、慧远等人的讲论下，北方佛学译释功业卓著。他们精通内典外书，以格义、连类、覆讲等方法讲释佛学。外国沙门僧伽跋澄、昙摩难提、佛图罗刹、僧伽提婆来到长安后，与道安、法和、赵正、敏智、佛念、慧力、惠嵩、僧略、僧茂等中土义学高僧或居士合作，译释了大量佛典。鸠摩罗什受困经年，终于 401 年被迎入长安，开启佛学译释事业，培养了僧叡、僧肇、竺道生、慧观、僧迁、道标、法钦等一大批义学僧众。外国沙门昙摩流支、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昙摩耶舍、昙摩掘多等人陆续到后秦，先后与罗什或其弟子共同译释，成果丰富。

（四）南朝（公元 420～589 年）译释学：锦绣斑斓

南北朝的分立造成其译释学气象与前一时代大不相同，故分南北而述之。

此时期学术大象：刘裕等军功寒族反抗门阀和门阀士族的内斗，导致南朝政权更迭频繁、国祚短促，也导致王、谢等高门士族陆续从政权中心退隐到纯学术和文艺圈内；而建立齐梁两朝的高门士族兰陵萧氏，也几乎同步发生了这一焦点转移。在此世风下，既产生了萧衍等大批僧儒，也产生了刘瓛、何承天、王俭、陶弘景、裴松之、刘义庆、王僧虔、任昉等大量通儒、玄儒、学问家和艺术家，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传世作品，说明译释技艺高度发达、儒佛二学相辅相成，造就了南朝学术、文艺的繁盛局面，为唐宋文化奠定了基础。

东晋之后，南朝的佛玄儒学一方面深度交融，另一方面也趋于分立。译释学经纬都有新的发展。佛陀什、释慧严、慧观、竺道生、慧琳、求那跋陀罗、释昙斌、智稜、拘那罗陀、真谛的佛经译释活动，和谢灵运、王练、王弘、范泰、颜延之、张融、刘勰、萧子良、梁武帝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8 页。

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人的佛儒译释，都充分体现了佛玄儒三学的互补互动、高度融通。另一方面，何承天、沈麟士、王俭、王僧虔、刘瓛、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场、徐勉、何胤、皇侃、沈文阿等大量纯儒、通儒的经学译释也同样活跃。最显著的一点是，义疏这一译释技术普遍为各家采用。^①

(五) 北朝(公元420~581年)译释学：平行发展

此时期学术大象：北朝官府为缓和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屡屡奖掖儒学以治世，力倡佛学以治心，儒佛译释经纬基本处于立体交叉、平行发展状态。据不完全统计，北朝各政权先后征召崔浩、李灵、刘献之、崔灵恩、颜之推等34位汉族鸿儒从事文化建设事业，并大力赞助了昙曜、慧可、菩提流支、法上、闾那崛多等人的佛典译释活动。此外，徐遵明、常爽等一代儒宗虽然不仕，但其译释活动对维系和发展北方学术文化，同样贡献甚伟。

在政权的扶持下，浮陀跋摩、道泰、昙无讖、惠嵩、道朗、吉迦夜、昙曜、刘孝标、慧可、菩提流支、法上、闾那崛多、那连提黎耶舍等佛经译释者向北方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继续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质料和修行方法，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在频繁残酷杀伐氛围中能够有所依托。卢玄、

崔绰、李灵、邢颖、高允、闾駟、刘昞、索敞、阴兴、宗钦、赵柔、崔浩、李灵、张吾贵、刘献之、房景先、崔灵恩、颜之推、徐遵明、常爽、沈重等大儒或儒宗，无论是应征入朝，还是坚辞不就，都通过各具特色的经学译释活动，接续和发展了西凉、长安、邺等我国北方地区的文化，淳化了社会风气和学术传统，将我国北方的学术文化维系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

本文作者：牛云平是文学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杨秀敏是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2014届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关于义疏体式的起源，学界有不同看法。例如，刘卫宁认为，义疏是受了佛家讲经撰疏和前儒章句启发而产生于东晋的训诂新体式；而申屠炉明、张帅认为，义疏并不一定是佛教舶来品，而很可能是南北朝以前儒家经学诠释体式自然演变的结果。详见刘卫宁：“两晋南北朝儒经义疏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申屠炉明：《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张帅：“南朝三礼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An Overview

Niu Yunping Yang Xiumin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lassic works has been the principal activity in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the branch of knowledge that focuses on such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practices can be termed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CTI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while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as undergoing both decline and expansion, Buddhism was streaming in. The two contrasting and interwoven academic movements activated all resources available, including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techniques and practicing scholars, and created one of the highligh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Keywords: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